

# 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英国脱欧

作者：斯图尔特·斯威尼

## 前言

## 英国脱欧，民粹主义的异样还是怒火慢烧的反抗？

2016年英国投票决定退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这是《罗马条约》签署59年后第一次有国家做出这样的决定。在这59年中，欧盟的成员国从6个增加到28个。很多评论家认为，英国退出欧盟只是一次简单的民粹主义偶发事件，与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类似。这种想法是非常不可取的。事实上，英国人民投票退出欧盟的原因有很多。“脱欧运动”缔结了一个原本不可能形成的联盟，它让英国中产阶级“疑欧派”、年长的工人阶级和反对移民的贫穷选民团结在一起。不同的英国选民表达了他们各自的担忧，但是他们的担忧集中在英国对本国边境、法律和金融的控制上。甚至于，整个欧洲一体化计划都遭到了英国人的质疑。有些英国人认为，与英国在1973年加入的更为直接坦率的欧洲关税同盟相比，欧洲一体化计划始终经历着“使命偏离”的过程。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后，英国的超民族主义者似乎在更为谨慎的一体化主义者和不情愿成为欧洲人的英国人面前占了上风。

另一方面，英国参与欧盟事务时依旧迟钝麻木。值得注意的是，在1979-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英国选民的投票率始终低迷，仅仅从32%增长到36%。而且，随着欧盟推动成立经济与货币联盟（EMU），这一数字在1999年暴跌至24%。在此期间，欧洲大陆似乎受到了英国“疑欧主义”的困扰，整个欧盟范围内的欧洲议会投票率从62%下降到43%。

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的“疑欧主义”越发尖锐。这要部分归咎于“精英”政客、公务员、新闻记者、学者和商人，他们认为，欧洲一体化议题的某些方面过于敏感，不适合公众讨论。相反，英国选民被要求跟随其他欧洲国家民众的步伐，朝欧盟前进，甚至要拿出更加积极的姿态。但是本书认为，对于例外论，要鼓励解释说明，而非谴责。在我看来，综观欧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因各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参与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也要寻求不同的方法，而非一刀切。新闻记者和评论家们未能把握历史差异，故而无法理解欧洲一体化计划的复杂性。于是，英国脱欧被误认为一个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插曲，没人觉得它反映了欧洲国家特有的历史遗产，即鼓励各国在安全阀内进行融合。

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以及2019年3月前完成“退出协议”的最后期限临近，英国的特殊性显而易见。尽管欧盟的谈判立场强硬，而且脱欧预期将给英国带来经济损失，但是在英国民调中支持“离开”的呼声仍然出乎意料地强劲。那些要求进行“人民投票”（或是第二次公投）的人也承认，这样的投票结果不确定性太强。最重要的是，有“天然的执政党”之称的英国保守党，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派。同时，英国两大主要政党中的另一个政党——工党，也在努力达成一个统一的脱欧政策。事情为何会走到这一步？想要解开这个疑问，我们需要深入了解英国和其他地方的历史文化，尤其是政治。

自1814年以来，英国在欧洲的形象肯定是下滑了。圣西蒙伯爵写出《欧洲社会的重组》一书时，正值拿破仑战争结束，通过武力征服统一欧洲的方法已告失败。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中担任约克城的法国炮兵队长的圣西蒙，督促英国和法国建立了一个联合议会。英国当时是世界大国，且自由传统气息浓厚，所以它向这个新立法机构派出的代表数量是法国的两倍。但是这种数量差异后来逐渐消失了，因为法国向商业和政治都已成熟的英国取了经。圣西蒙认为，当时的德国正在变成欧洲第三大国，它虽然在政治上还不成熟，但前景是光明的。德国邦国之一普鲁士和其他说德语的强国，将从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古老的国家那里学会如何加入欧洲三大强国组成的团体。的确，有英国和法国做自己的高级伙伴，德国可能会避免一场查理一世或路易十六经历过的破坏性革命，这两位都是欧洲弑君革命的受害人。

圣西蒙清楚地认识到，在欧洲事务中，英国已经从主导者沦为边缘角色。在圣西蒙身后，到夏尔·戴高乐担任法国总统时期，英国已经变成了欧洲事务的旁观者。后来，在科尔任德国（联邦德国）总理、密特朗任法国总统时期，德、法两国关系亲密，英国的地位也一直没有改变。终于，到了默克尔时期，这位德国总理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将英国描述成了欧洲的“问题儿童”。简而言之，英国的发展下行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三个领导欧洲的国家。在了解这三国的发展过程后，我们慢慢理解了为什么英国会被排挤出或者说自愿退出欧洲强国之列。

法国和英国是成熟的统一民族国家。但是德国历史特殊，是否是“民族国家”颇具争议，因为德国直到1871年才实现统一。在此之前，它是德意志及其他国家（帝国）组成的神圣罗马帝国。从神圣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20世纪，我们所理解的“德国”的边境一直在变化。不过，圣西蒙和其他一些人都意识到，这个帝国中可能会发展出一股说德语的力量。1806年，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占领柏林，这个帝国崩溃了。但是，1871年俾斯麦的“小德意志”方案，部分重建了昔日的帝国。

尽管这个帝国里有人不说德语，但是排除讲德语的瑞士人、大匈牙利人以及东普鲁士人，1648年后，在这个由多个国家和城市组成的松散联邦里，说德语的人依然占了压倒性的优势。并入大普鲁士范围的勃兰登堡州崛起了强大的霍亨索伦家族，成为推动这个欧洲第三大国发展的动力。后来，在普鲁士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国，成了现代欧洲不逊于法国和英国的存在。英、法、德这三个不同的语言区一直在相互竞争、相互融合。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结束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的和约。1648年10月在威斯特发里亚签订。和约规定：德意志境内新教（路德宗、加尔文宗）和旧教（天主教）地位平等，各邦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自主权；法国取得阿尔萨斯大部，并继续保有洛林的梅斯、土尔、凡尔登等地；瑞典获得西波美拉尼亚全部、东波美拉尼亚一部分、不来梅和维尔登两主教区，以及维斯马城。承认荷兰和瑞士独立。它加深了德意志的分裂割据局面。——译者注

从更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英、法、德这三个国家的关系，几乎代表了自1648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

重新划分欧洲版图之后的主要历史。而且，这也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趋势。但是，个别欧洲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会阻挡这个趋势，由此我们可以预测并且应对英国脱欧这样的事情。简而言之，广义上的欧洲一体化是英、法、德这三个国家巩固加强外交、经济和文化联系而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三个国家同时关系融洽的情况十分罕见。一般是其中两个国家寻求建立友好关系，而这样会损害第三个国家的利益，英国历史和欧洲历史都曾因此蒙上阴影。这就佐证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说法：两人是伴，三人不欢。

从欧洲三大强国的角度来讲述欧洲一体化的故事时，我们预设了这三个国家是最重要的。不可否认，如此突出英国、法国和德国的重要性，我们会冒着目的论的风险。不过，英国和法国是1648年之后发展起来的两大民族国家，而人口最多的德国语言区是从最早的联邦制实验中发展出的民族国家，所以，将注意力放在这三国上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它们不仅仅是20世纪的欧洲强国，而且在法国国王亨利四世、资格会教廷威廉·佩恩或圣西蒙本人设计的任何欧洲众议院中都能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不用担心欧洲其他国家会被排除在外，因为从三个不同文化区的角度来综合审视欧洲是可控且深刻的。此外，它也不会阻碍我们在做比较时考虑包括西班牙、荷兰、意大利、俄罗斯在内的其他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比如，美国1788年生效的《联邦宪法》就激励或哄骗了很多致力于推动欧洲一体化的人。1778年，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与欧洲其他国家结成了反英同盟，此举是为了压制英国的海上力量和整个大英帝国的实力。在一些人看来，这表明了欧洲的立场。

如今欧洲再次面临挑战，读者们可以退一步来考虑问题，避免对英国脱欧做出恐慌性反应。毕竟，英国历史表明，英国人对有决策权的联邦组织或跨国组织会感到不安。确实，2016年的英国全民公投，揭示了英国人在货币政策、人员流动和司法等领域对超民族主义的抗拒。最近，英国政客们都在讨论退出欧盟后是否应该留在欧盟单一市场或者欧洲关税同盟。但是，英国两大主要政党并未强烈反对脱欧。在2017年6月的大选中，工党和保守党获得了1970年以来占比最高的总选票（87.5%）。两党都在竞选活动中发表了“支持脱欧”的宣言，几乎没有为举行第二次公投留下余地。这使得英国很可能会离开欧盟（无论是“软脱欧”还是“硬脱欧”）。但是，这并没有改变欧洲一体化的趋势，它只是让欧洲的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和现实。

一种重商主义的形式，强调促进国家福利状况，认为增加国家的货币财富就能增强国家的经济力量。——译者注

2017年3月，欧洲三国集团中被孤立的英国，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正式启动退出欧盟程序。此后，媒体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进行了跟踪报道和评论。英国新闻界对脱欧运动主要倡导者的个人情况以及这件“离婚案”细节，进行了狂轰滥炸式的报道。但是，除了让-克洛德·容克（时任欧盟委员会主席）、米歇尔·巴尼耶（时任欧盟首席谈判代表，负责与英国就脱欧事宜展开谈判）、居伊·费尔霍夫施塔特（时任欧洲议会脱欧谈判代表）和其他的媒体宠儿，幕后谈判主要由英、法、德三国主导。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样才能了解它们的谈判立场。所以，作为旁观者的英国人，无法理解法国对超民族主义的支持，除非他们能理解法国的历史及其对欧洲的持久抱负。同样地，德国的动机似乎出自天然的经济野心和守旧的官房主义

本能，其根源来自早期联邦德国各邦的动态。

与此同时，德国也乐于让法国在外交和战略事务上发挥带头作用。可以理解，德国希望避免过度介入那些在20世纪里产生过灾难的领域。对比之下，英国推行源自约翰·穆勒和自由贸易传统的新自由主义议程，对所有的中央集权体系结构都视而不见。当然，现实要比上面这几句概述更加微妙和精彩。这些微妙之处，正是我们将要研究的。其实，主导谈判的是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而它们是由战争、经济、帝国和宗教等方面的经验决定的。

更通俗地说，欧洲一体化（及欧洲的分离析）的进程，正是通过这三个国家的历史展现出来的。而且，从欧洲人在过去的1648-2018年的370年里对变化和逆转做出的反应中，我们可以找出推动英国与欧洲建立更深层次联系的模式。事实上，战争、政治革命、宪法改革、工业革命、经济周期、去殖民化、移民、宗教问题和欧洲“其他势力”的挑战等，都使得这三个国家不得不进行合作。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都在竭力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避免与他国有制度性的联系。毕竟，战争的破坏性越来越大，而人们也提高了对经济的预期，多个欧洲国家经济崩溃，世俗主义成了一体化的影响因素。伴随着冷战和核战争的威胁，“其他势力”的威胁达到了可怕的程度。同时，欧洲担心自己的经济无法与其他经济体竞争，首先是美国，然后是日本（时间比较短暂），最近的则是中国。因此，在这些危险面前，三大国主导的欧洲一体化成了当务之急。在经济、贸易、外交和国防上，三大国一直在寻求达到质变的临界点。在此过程中，它们依靠的是欧洲国家的身份，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

这是一种长远的观点，但它是非正统的。很多学者以1950年的“莫内计划”为界，对欧洲历史做了一个时间上的划分。在他们的解读中，早期的特点是宏大的计划和哲学文本，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提供了有形的立法（基于条约）变化。但是，将通过协议实现一体化、通过正式制度安排促进一体化进行绝对区分，是有误导性的。毕竟，协议可以被撕毁和修改，倾向于一体化的机构（如国际联盟）可以不复存在，欧盟或是欧元区也可能会有成员国退出（例如英国和有潜在的希腊）。对欧洲人而言，一体化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可能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例如，德国前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强调，欧洲一体化的基础是“人员自由流动”，这一点已经通过近年来的条约修改实现了。对于像法国前总理白里安、法国前外长罗贝尔·舒曼、战后“欧洲之父”让·莫内、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这样的欧洲一体化主义者而言，这似乎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同样地，对于早期的作家萨利·托马斯·佩恩和圣皮埃尔神父来说，这的确是不可接受（并且不切实际的）。当然，由于现在欧洲申根区开放边境遭到异议，“人员自由流动”可能再次成为问题。

然而，对欧洲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法、英、德关系中再次出现的民族差异问题，正在威胁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英国接受了自己常被提及的“半脱离”外交形象。英国似乎决心在不成文的宪法下采纳一种务实的、符合“常识”的方法建设国家。“老奸巨猾的英国”对欧洲大陆的“演绎”推理法、宏伟计划、《拿破仑法典》和联邦制度仍然持怀疑态度。与此同时，法国和德国的政治精英们努力通过货币、财政和政治联盟寻求深度的一体化。引人注目的是，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凸显了三大国之间同时保持亲密关系的困难性。英国试图就阻拦东欧移民举行谈判，但显然这一尝试在法、德两国方面得到的支持十分有限。法、德两国在挑战“人员自由流动”上都有所保留。法国行政长官们对变更欧盟条约深恶痛绝，他们的宪法和法规思想根深蒂固。同样地，德国的行政长官们依然畏惧撕毁规则，也许是因为想起了德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创伤。

但是，本书认为，英国脱欧不会破坏欧洲合众国的联邦梦。毕竟，这个联邦计划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其根源可以追溯到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领导的关税同盟，以及后来的德意志国家联合体。颇为讽刺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约翰·杰伊之所以在1787-1788年创作出了《联邦党人文集》，正是因为他们在统一英格兰和苏格兰时的联邦制创新所触动；看到了奥地利在17-18世纪的苦苦挣扎后，他们对软弱无力的帝国机制印象不佳。

现今由27个国家组成的欧盟仍然会是一个强大的机构，还有很多国家等着加入。而且，随着英国的离开，欧盟内部非欧元区的比重大大降低了，剩下的8个非欧元区国家可能会面对与欧洲中央银行（ECB）保持一致架构的压力。简而言之，建立欧洲合众国有着十分强劲的历史动力。正如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的妙语一样：欧洲将“尽一切努力”让一体化计划继续下去。但是，如果读者们对1648-2018年的370年的漫长历史没有概念，那么他们就会被这些表面的趋势所迷惑。德拉吉在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中使用的“巨型火箭筒”策略已经体现了欧洲一体化的稳健性，这是欧洲在几个世纪的联合史中积累的成果。过程中的挫折，让人们更加专注于团结统一。

事实上，欧盟剩下的“两大巨头”现在有机会主导欧洲一体化计划，可以不再受到英国“疑欧主义”的困扰。马克龙领导的法国可以继续影响欧盟的官僚文化，尤其是对欧盟委员会。法国的这一角色反映出，在过去，欧洲大陆的影响力才是首要的，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冒险永远是次要的。这一点和英国不同，英国的重中之重是贸易和海事。此外，法国的文化和社团主义可以在欧盟蓬勃发展，并控制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因撒切尔夫人带来的单一市场制度化。只要能确保自己是这些长远安排的架构师，法国就可以接受在经济主导国德国面前扮演辅助角色。

的确，本书揭示了欧洲人一直不愿意接受单一经济强国德国主导下的稳定，但是德国的经济霸权今天仍然因为虚弱的外交和军事受到掣肘。尤其是德国的武装力量一般，没有核武器，也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席位。德国可以继续在中欧的俄罗斯及前军事盟友土耳其之间扮演传统的中间人角色，而且它现在还是大规模移民前往欧洲的通道。德国在这些地区的支点地位，使得法、德联盟能在欧洲重新发挥领导作用，欧洲一体化进程也不会被迫不及待的东欧人破坏。在众所周知的波兰与沙皇凯瑟琳大帝的决裂中，沙俄和德国牢固的历史联系帮助波兰巩固了其中欧的特殊地位。

与此同时，随着法、德两大强国寻求欧盟伙伴国关系，英国只得在欧盟以外发挥作用。英国半脱离于欧盟正式框架外，却享受着慷慨的欧盟贸易协议，它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积累的帝国贸易经验，毕竟先前英国一直是欧盟的第二大经济体。英国以“资本主义绅士”做派，长期斡旋在美国促成的全球化与德国促成的欧盟社会市场之间。置身于欧盟之外的英国，能够继续走这样的居间路线，充分利用其自由、统一且务实的帝国历史经验。因而，这三个欧洲关键国家的一体化能够以更加可持续的方式继续下去，每个国家都会在历史特殊论中发挥自己的力量。但对英国而言，最终获得50多年前与迪安·艾奇逊（时任美国国务卿）一起竞争的地位并非易事。毕竟，法国和德国质疑英国是否有充当美国和欧洲之间桥梁的价值。本书一再讨论的欧洲历史表明，欧洲各国如果感觉到被逼入了绝境，或是寡不敌众，就会陷入集体不安，甚至最后会发生暴力。对待欧洲，不能过于乐观。

所以，欧洲投入的赌注已经到达了峰值。在此背景下，研究一波三折的英国脱欧谈判能带来一些启发。英国不得不在民族主义（边境控制与疏远欧盟法院）和自由贸易（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成员身份）之间寻求平衡了。英国保守党和下议院内部很难就此达成共识。与此同时，欧盟已经展示出了其余27个成员国在面对英国这一“其他势力”时惊人的团结。的确，由于英国继续寻求与欧洲保持“半脱离”状态，被很多人视为远期目标的欧洲合众国再次激励了法国和德国。尤其是马克龙，已经欣然接受了为达成经济与货币联盟采取的进一步经济一体化措施。他提出了一个由欧盟各国共同承担的“欧元区预算”，不过德国担忧自己会在欧盟中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默克尔可能无法在任期内看到最近有所缓和的法、德关系开花结果，但这再一次展现了法、德伙伴关系在经过一段长期发展后产生的力量。

一千多年前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分裂而无疾而终的谋划，将因法、德的正式伙伴关系重启，但这不一定意味着欧洲一体化的政策和经济就会崩溃。有了稳固的欧洲基础，英国可能会与欧洲合众国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同样地，如果欧盟放弃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而选择更为务实的政府间主义，这也不失为一种不同形式的欧洲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意味着组织安排更为宽松，但它的基础同样是厚重的历史与规模经济逻辑。

因此，得益于这三个国家丰富多彩的历史，以及它们之间随时间推移而演变的相互关系，我们试图总结出事情发展的方向。同时，我们必须警惕历史学家经常提出的警告：过去未必能够指引未来。

## 第一章

### 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德意志帝国：战争、政治和外交（1648-1864）

在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这两个主题上，我们将聚焦战争、政治和外交。这牵扯到欧洲在分分合合的不同时期里涌现的政治家、将军和哲学家们，以及由他们推动的事件。我们将证明，英、法、德三国间的利益交织已经达到了必须合作的程度，这意味着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外交已经制度化了。

17世纪中期，牛津大学的宿命论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在全欧洲范围内实现利维坦国家统一可能有助于欧洲的稳定。霍布斯也是英国内战时期的作家，并观察了欧洲以德国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三十年战争。这些重大事件影响了他的观点。但在三十年战争这场灾难性的欧洲大战后，参战国达成了《威斯特发里亚和约》，避免出现一个独裁的泛欧君主。相反，为了欧洲暂时的和平，各国本着一定程度的宗教宽容做出了妥协。

这是在奥地利以外广大的德语国家里，中央集权政府与得到下放权力的天主教和新教诸侯们的无奈妥协。到了1678年，德国政治哲学家塞缪尔·冯·普芬道夫，将这个继威斯特发里亚王国之后的神圣罗马帝国描述为一个政治妥协的产物，甚至是“怪物”。它佯装成一个国家，却损害了各个德意志邦国的利益。普鲁士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和信奉天主教的法国结成了盟友，它在战争期间受到了神圣罗马帝国和瑞典王国的劫掠，但是，战争为普鲁士提供了成长的平台，让它逐渐取代奥地利成了德语国家的核心。欧洲后来也因此演变出了“三国”均势，而这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

虽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得到了土地，并欣然披上了宗教外衣，但是17世纪欧洲最强大的力量却是法国。本书行文采用的三国视角源于法国在欧洲内部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竞争，以及在欧洲外部与英国的较量。在接下来的数年中，这一局势展现出无比持久的生命力，尽管普鲁士逐渐取代奥地利成了德语世界的中心。的确，从古罗马政治家塞涅卡的修辞手法到基督教神圣的三位一体，“三”在西方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格局。但是，我们也将发现，三国集团三位一体的稳定是难以实现的。

## 俄罗斯：第四股力量

大北方战争（1700-1721）：又称为第三次北方战争，是俄罗斯帝国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而与瑞典王国争霸的战争。——译者注

虽然法国、英国和普鲁士德国之间的动态是讲述欧洲战争与一体化的基础，但它也时常会受到其他强大力量的冲击，有时这种冲击甚至是毫不含糊的。尤其是俄罗斯，它从彼得大帝时期起在欧洲的战争与和平史中几乎无处不在。事实上，俄罗斯在欧洲权力地位上的优势，始于1721年它在大北方战争

中战胜瑞典。自那时起，身为欧亚国家的俄罗斯，使英国、法国和德国三大国之间的军事和战略平衡变得复杂起来，欧洲一体化进程也更加脆弱。此外，欧洲列强在不同时期或低估或高估了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同样产生了不利于稳定的影响。俄罗斯帝国的地理距离和幅员让人难以看清它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实力。

## 1648年后的欧洲：三十年战争的遗产和“太阳王”

俄罗斯作为“第四股力量”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在我们的欧洲故事里，法国才是核心。的确，早在16世纪，加尔文教徒亨利四世国王与英格兰的新教徒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讨论建立联邦欧洲时成了朋友。对此，亨利四世的首席部长、第一代叙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德·贝蒂纳（胡格诺派）煽情地称，亨利四世和伊丽莎白一世“是设计这一体系的两位君主”，还“将法国君主和英国君主的利益联结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但到了1593年，亨利四世为了继承法国王位摒弃了加尔文教，排挤了他的新教盟友伊丽莎白一世，并宣布“为了巴黎，值得做一场弥撒”。为了统一自己的国家，这位法国国王选择了天主教，而不是更费力的欧洲大业或是对新教的忠诚。

法国在三十年战争这场意义重大的欧洲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明显体现了务实主义（或机会主义）趋势。这次冲突源于哈布斯堡王朝皇帝对神圣罗马帝国的新教徒发起的攻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洲大陆上包括法国在内的所有强国都被拖入了这场宗教和领土的冲突中。斐迪南二世鼓动法国和欧洲北部所有的新教势力结盟，主要是瑞典、普鲁士、尼德兰联省，引发了天主教法国的极度反感。法国起初并非战争的焦点，仅仅是为瑞典的新教军队提供资金。但在1635年，法国对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宣战，并与主要竞争对手奥地利发生了全面冲突。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场对抗代表着哈布斯堡王朝为了在欧洲实行天主教霸权发动最后一次可靠的尝试。法国当然也在欧洲寻求霸权地位；但是，人们认为，法国在与新教徒联手对抗天主教同伴和教皇中表现出了赤裸裸的投机主义。

三十年战争是一场真正的全欧洲范围的冲突。除了英国以外的所有主要国家都参与了这场战争。引人瞩目的是，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明智地拒绝了和新教徒同伴们一起对抗统治奥地利和西班牙的天主教哈布斯堡王朝。最终在1648年，战争带来的破坏促成了《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的签订，协议承诺欧洲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互相宽容忍耐，还要在分别以法国和奥地利为中心的两大“联邦”间实现权力的平衡，不论这种平衡会有多么不尽如人意。但在《威斯特发里亚和约》签署后，法国和西班牙这两大天主教势力为了巩固自己在欧洲的地位，继续交战了11年。最终，西班牙在欧洲的反改革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促使英国清教徒奥利弗·克伦威尔加入了法国的阵营。于是，三十年战争及其余波，终于影响到了欧洲全境。

后来，由于全面战争引发了大屠杀，《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体系允诺在欧洲进一步实现和平与一体化，尤其是在三大国之间。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三十年战争的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碾碎了两个对立的联盟。奥地利接受了在欧洲不再能够杜绝改革的现实。宗教宽容必不可少。尽管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仍然反对改革，但奥地利和欧洲中部还是进入了相对平稳的时期。我们将看到，在经济增长的支撑下，德意志各王国可以在这种平稳的局势下进行国家建设。在战争中士气受挫后，德国人的处境终于逐渐好转。奥地利毫无活力的中央权力也不再形成阻碍。

当《威斯特发里亚和约》订立时，年幼时就登上王位的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四只有10岁。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路易十四和波旁家族都深深沉浸在“君权神授”的想法中。这些观点和坚定的领导风格让他认为，法国作为欧洲的利维坦可以摆出更为霍布斯式的姿态。路易十四挑战了当时外交上的均势，追求法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为了支撑自己的雄心壮志，他充分利用了法国的经济和人口。简而言之，这个“太阳王”的名言“朕即国家”与法国在欧洲的支配地位相吻合。路易十四可以对西班牙、尼德兰联省、德意志诸国发动战争。后来在1678年与荷兰人签订《奈梅亨和约》时，他的代表们协商出了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款，获得了新的领土。但是，在秉承着机会主义进行了三十年战争以及路易十四的一系列战争后，法国在欧洲背上了侵略者的骂名。的确，很多讲德语的欧洲人都将法国视为自己永久的敌人。毕竟在17世纪，位于欧洲地理中心位置的他们受到了法国政策的巨大影响，甚至延续到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

## 欧洲专制主义与宗教不包容：明显的分裂

为了追求成为欧洲巨头，路易十四投入法国的税收征战欧洲大陆。他既是法国的象征，也是唯一的权威。的确，早在1666年，他就简洁明了地给他眼中的专制主义下了定义。他宣称“国王是绝对的领主”，天生拥有所有财富的自由处置权，无论是教会财产还是世俗财产。因此，权力集中到了君主的手中，他的地位比法国第一等级与第二等级更高。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劲敌哈布斯堡皇帝，后者统治的是一个松散的说德语的联邦。我们将会发现，在欧洲一体化的政治进程中，散漫的权力与联邦的权力之间的冲突频繁地分裂着欧洲。

但是，在路易十四时期的欧洲，关于中央集权与联邦制的晦涩争论是无要紧要的，英语、德语和法语世界之间的均势出现了问题。凭借着欧洲最多的人口以及最高产的农业，法国的专制主义占据了主导。经济影响力支撑了路易十四的扩张野心。与此同时，与法国在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中交战到筋疲力尽的宿敌哈布斯堡帝国，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威胁而深受困扰。168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围攻维也纳时，这种困扰到达了顶峰；路易十四则希望哈布斯堡王朝能被彻底击垮。

与此同时，英国查理二世复辟斯图亚特王朝后，沦为了路易十四统治下的“儿皇帝”。英国已经不复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时的都铎王朝风采了，它曾计划与路易十四的祖父亨利四世一起建立一个联邦欧洲。的确，在1682年，即查理二世去世的三年前，浮华的法国宫殿迁至凡尔赛，体现了“光荣革命”前法国和英国不平衡的力量对比。通过征服与控制，路易十四可以不受限制地推动独特的欧洲一体化。

路易十四没有促进欧洲不同的宗教信仰与不同的种族民众间的团结统一。这让加尔文派教徒在英格兰、苏格兰、尼德兰联省以及德国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们都对极权主义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极度不满。路易十四引发纷争的行为是在1643年继承了法国王位后对新教徒采取了激进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政治与宗教不团结且路易十四主宰着欧洲的时期，欧洲的合作空间很小。的确，与在高位时期统治大英帝国的查理五世相比，路易十四控制的领土面积较小。但到了17世纪后期，法国逐渐稳固了统一的专制国家地位，不像奥地利一样受到内部纷争与联邦制的困扰。

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以及对法国霸权的追求，与其祖父亨利四世早前的欧洲愿景相去甚远。作为波旁王朝的第一位国王，亨利四世提出了建立一个欧洲“所有王国的联盟”的“宏伟计划”。他统治的将“不仅仅是法国，而是整个欧洲”，其手段也不是征服，而是宪制。他的欧洲宪法议案中提出要通过一个总理议会制衡专制主义。这个理事会代表了整个欧洲，包括法国的宿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以及教皇。这些安排的依据是“希腊古老的近邻同盟”模式。事实上，叙利公爵根据这样的“宏伟计划”预判会发生一场早期的外交革命。在法国出资的情况下，将成立一个横跨奥地利与西班牙的联盟。值得注意的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被排除在亨利四世的庞大阵营外，对欧洲而言它依然是一个“他者”。

但到了1688年，亨利四世的孙子的做法实际上并不开明，更多的是赤裸裸的机会主义。路易十四与欧洲主要国家组建的“大同盟”进行了“九年战争”（1688-1697）。这一时期的法国彻底抛弃了整个基督教欧洲，甚至是自己的天主教伙伴；路易十四反而和土耳其苏丹成了盟友。于是，欧洲反对专制主义法国国王的势力联合在了一起。因此，在西班牙和萨伏依公国的支持下，信仰新教的尼德兰联省执政长官（当时也是英格兰国王威廉三世）和天主教徒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一世，领导了反法武装。在随后的战役中，法国的侵略和暴力行径给整个欧洲留下的多是痛苦，这一点在德国尤为明显。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在1689年恣意破坏德国的海德堡的行为，让德国人眼中的法国进一步妖魔化。

九年战争结束后，根据《里斯维克和约》（1697），路易十四拿下了阿尔萨斯，但交回了洛林。于是，位于德、法之间的“中间王国”阿尔萨斯、洛林就此分裂。此后，位于德、法边境的这两块敏感领土便多次易手。路易十四还被迫放弃了信仰天主教的英格兰斯图亚特王朝国王詹姆士二世，不情愿地承认信仰新教的奥兰治王朝的威廉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国王。最后，英国、尼德兰联省和德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将法军赶出佛兰德斯和莱茵地区。这些计划对英国人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英国人促使低地国家维持中立，让法军（以及后来的德军）远离英吉利海峡的港口，这成了欧洲战争与和平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它反映了英国人海洋性的超脱，这种心理让英国人不愿接受欧洲人的身份。

## 威廉·佩恩以及早期英国的“联邦制”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试图围绕法国、奥地利及其盟国建立力量的平衡。对此，路易十四几乎是立即就发起了挑战。后来，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德国统一后的威廉二世、希特勒，又给欧洲和平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促生了新的、相互敌对的欧洲联盟。但是，建立军事同盟并非是对欧洲不稳定局势的唯一方式。思考欧洲和平与一体化的其他地区的人们，理智地考虑到了这样的和平所面临的危险。

例如，当路易十四在1693年向泛欧国家联盟发起挑战时，威廉·佩恩在欧洲地区倡导宪政进步，并出版了《通过建立欧洲议会，展望欧洲现在与未来的和平》。佩恩是早期的英国贵族教徒、散文家与商人，他现在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是建立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作为属于英格兰圣公会的基督教徒，他熟知欧洲在政治和宗教上的分歧。事实上，他乐观地认为，由于九年战争中的流血和牺牲，以及爱尔兰对英格兰在1688年成为新教国家的忧虑，一场和平运动正在萌芽。为了倡导宽容，他仿照奥地利模式设计了一个联邦式的“帝国国家”，欧洲议会将依据“领土价值”按比例分配投票权和代表权。

因此，“德意志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派出12名代表，法国的代表数略少（10名），西班牙也是10名，而英格兰仅有6名。其他更小的国家占据了剩下的名额，尤其是“土耳其人和莫斯科人”，虽然关于他们是否属于欧洲引起了争议。事实上，在佩恩的“帝国议会”计划中加入土耳其的穆斯林是为了保障和平，挽救基督教自宗教改革以来因数次宗教战争而被摧毁的声誉。包容可以避免破坏性的猜疑与不宽容。同样，四分之三以上的多数投票才能决定欧洲的多元化机制。这在消灭议案蓄意阻挠者的同时也保障了少数派的利益。简而言之，这些跨国的制度安排会比亨利四世的做法更具普适性，后者认为将奥斯曼帝国排除在统一的基督教欧洲之外并无不妥。当然，很久之后，欧洲的这一基督教身份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尤为显著。事实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土耳其的成员身份频繁引发讨论，但是都遭到了基督教欧洲的阻拦。从这个意义上说，佩恩的观点是相当激进的。

有趣的是，佩恩在成员国问题上的实用主义观点，以及对欧洲外交的洞察力，都源于他自己的商业经验。他明白，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路易十四统治的法国）将会反对这样的联盟存在，因为它预计这样的安排会损害自身利益；但是，如果反对国的声音更为普遍，也不会有任何一国愿意凌驾于他国之上，所以法国应该被迫加入联盟。不幸的是，这份自信并无根据。直到因军事失利以及无法承受财政负担而屈服前，法国一直奉行着单边主义。确实，之后的历史多次证明了劝说这个最强大的欧洲国家在战后接受类似的安排是非常棘手的。

让人沮丧的是，1693年，佩恩低估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的确，人们很难相信一个英国贵族派殖民者会对法国人的想法产生重大影响，哪怕他曾经在德国生活数年，且在法国王庭工作过。佩恩影响的反而是后来的美国革命者，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但是，路易十四在18世纪早期遇到了新兴欧洲国家的抵抗。这让人们怀疑法国能否保持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也佐证了佩恩的断言：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能够永远支配欧洲的架构。尤其是复辟的威廉三世以及联合起来的“海上力量”的存在，让法国的孤立对路易十四这位波旁国王而言变得危险。他们发挥反抗力量的场合是在战斗中，而不是在欧洲议会的早期雏形中。事实上，欧洲人还要等待很久才能见到欧洲议会的出现。

选帝侯：神圣罗马帝国参与选举德意志国王的诸侯。——译者注

## 联邦制下作为选帝侯 的德国和英国

如果说《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体系在维持欧洲和平上表现得并不尽如人意，部分原因也是法国的权力没有得到制约。幸运的是，另外两国——英、德的发展进步解决了这个问题。它们的发展是有联系的，英国和德意志诸国通过王朝纽带联系在一起，这有助于削弱法国的主导地位，但是英国和德意志诸国的力量也给维系欧洲和平带来了新的问题。1688年的“光荣革命”，对英国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人们认为，自此贵族接管了英国，夺取了亲法的斯图亚特王朝的权力，它意味着英国的国家实力得到了全面加强，也预示了英国将与威廉三世的荷兰合并为君合国，甚至一些人认为是荷兰接管了英国。随后，英国追随着荷兰伙伴的步伐建立了国家债务计划（1693）以及英格兰中央银行。这些举措维持了英国公共财政的偿付能力，让在18世纪多次与法国产生冲突的英国受益匪浅。对比之下，法国就没像英国一样保证金融安全。

当时，随着荷兰联省逐渐丧失制造业能力，英国超越了它们的荷兰伙伴。阿姆斯特丹的经济中心地位被取代，意味着17世纪最强大的国家荷兰明显开始日薄西山。已经戴上英格兰王冠的荷兰执政——奥兰治亲王威廉，尤其关注荷兰地区竞争国的弱点。到了1707年，英格兰因为签署了与苏格兰的《联合法案》进一步增强了力量。英国国王与王庭站在了和法国王庭更加对等的位置上。事实上，由于汉诺威王朝的存在以及英国与重要的帝国国家荷兰的结盟，英国与法国的关系恢复到了接近亨利四世—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状态，不复斯图亚特王朝时期的屈辱。

这场具有启示意义的英国“联合”鼓舞了18世纪80年代末期的美国联邦主义者，处于萌芽之中的美国与“反联邦主义”力量展开了较量。英格兰与苏格兰的联合给予了英国力量，苏格兰获得了下放的权力，英格兰的军事和财政实力则提供了支持。与此相反，美国人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联邦制不屑一顾，当时德意志诸国各行其是，联邦常常在战争中分裂，它们像独立国家一样运作，拥有各自的军队和政府。这对经济效率是有益的，德国的官房学派经济体现了这一点，但是，它并没有被美国开国元勋们接受。然而，1707年的英国模式，对很多效仿者而言又过于集权了。

在此时的英国王庭，汉诺威王朝成功地在安妮女王死后实现了王位的无缝衔接。这也促进了英国、奥地利和德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乔治一世于1714年登基后，英国国王成了神圣罗马帝国七位选帝侯之一，直到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因此，凭借着对苏格兰的控制权以及在神圣罗马帝国选举中的投票权，联邦制在18世纪开始渗透到英国的政治体制中。事实上，英国比德语世界领先一步为联邦制指明了宪政方向。

当英国从这些经济和政治变革中受益时，汉诺威王朝的统治也让英国社会中的英、德联系发展到了高潮，并一直持续到1917年。人们认为，这些联系在不同时期都将信奉新教的英国与德国联合了起来，一起对抗坚定信奉天主教（反联邦主义的）的法国。例如，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长期统治中，以及她与萨克森-科堡-哥达亲王阿尔伯特的婚姻期间，这些联系都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可惜，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威廉二世，却是一个坚定的仇英者。与此同时，她的儿子爱德华七世也会打压亲法派。因此，到了1917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胶着时期，国王乔治五世颁布了王室法令，将家族姓氏从萨克森-科堡-哥达改为了温莎，仅仅依靠王室联系是无法将英国与普鲁士及其他更小的德意志诸国联合起来的。

的确，整个欧洲的王室家族之间都维持着王室友谊。正是因为这一点，英国和德意志各邦国有别于1789年后的法兰西共和国。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与现在相比，当时的欧洲各国更愿意选择君主制或共和制。



## 第二次百年战争

1712年，乔治·弗里德里克·汉德尔离开汉诺威宫廷，前往英国为安妮女王作曲，之后又留下侍奉新国王乔治一世。值得注意的是，路易十四在位期间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文化交流。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确去了伦敦，但这也仅仅是为了在远处批判法国的专制主义。事实上，在欧洲进入18世纪后，英国与法国的对抗成了战争与外交的主旋律，取代了上个世纪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对抗。所谓的“第二次百年战争”，大约从1688年奥兰治亲王威廉登上英国王位，持续到了1815年拿破仑的最终溃败。1716-1731年有过一段插曲，当时的辉格党（执政党）和亲法的托利党（在野党）都支持建立英法同盟，但是最终结果并不如意。英、法两个欧洲大国之间的殖民斗争破坏了结盟进程。

事实上，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中，英国对欧洲事务表现出了同样的半疏离态度，使得法国和德国一直倍感沮丧。英国用雇佣兵和贿赂对付他国，反映其对欧洲大陆的承诺是苍白无力的。事实上，到了18世纪初，伦敦金融城所宣传的一种严谨的财务文化在英国流行。伦敦严格审查开拓欧洲的花费，大兴军事力量遭到了冷遇。必须有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威胁或有对英国商人的明显利好，英国才会参战。事实上，这个后来被拿破仑蔑称为“商贾之国”的国家已经占据了上风。相比之下，法国的支出都用于维持国家的威望，于是它到1789年便破产了。官房主义的法国与自由放任主义的英国之间的对比是一个更大的话题，我们将在讨论经济时对其加以探讨。

《乌得勒支和约》：结束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系列和约。——译者注

根据1713年的《乌得勒支和约》，英国商讨出了承认新教地位的政治和解方案。这个和约巩固了欧洲力量之间的均势，这正是英国所希望看到的，同时英国也正式控制了与波旁王朝有争议的土地。但是第二年，仇法的汉诺威选帝侯继承了英国王位，成了乔治一世。他在伦敦抱怨《乌得勒支和约》没有惩罚侵略者法国。这位说德语的国王只会一点英语，他担心在《乌得勒支和约》“背叛了新教大业”后，法国会再次发动侵略战争。不过，随着汉诺威王朝掌权而出现的“辉格臻荣时代”（1715-1760），则接受了这个和平协议。辉格党人认为，英国已经取得了海上优势，而欧洲大陆国家却斗得不可开交。随着英国早期两党制政体的发展，英国因为与欧洲的隶属关系分化出了党派忠诚：辉格党人成了坚定的新教徒和亲德派，而高阶层的英格兰圣公会托利党人则对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展现出了同情。本书的第七章将详细讨论这些宗教差异。

诚然，到了18世纪中叶，英国政府与法语世界和德语世界结成的同盟，并不能证明欧洲的一体化。后来，斯图亚特家族的最后一位王位“觊觎者”查理王子带领信奉天主教的族人南下，在1745年最终抵达德比时，与他交战的是一位德国国王以及汉诺威王朝。得到法国支持的苏格兰人与汉诺威王朝的英格兰人的最终之战——卡洛登战役，是不列颠岛上的最后一次重大战役。

## “太阳王”之后对“永久和平”的长期等待

欧洲的均势在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后彻底打破。路易十四是一个专制主义国王，战争于他如同职业一般，是他和国家（两者其实是同一回事）获得威望和荣耀的手段。他对与英国和德国建立实质性联盟并不感兴趣。他还拒绝了亨利四世和威廉·佩恩推行的建立欧洲联盟的“伟大计划”。1715年后，由于连续多任法国国王的软弱，显然旨在抑制法国扩张的《乌得勒支和约》暴露了其欧洲发展反应迟缓。如果没有路易十四的专制主义，英国、尼德兰联省以及法国可以组建一个三国联盟（1717）。

第二次百年战争中的这一插曲是一个罕见的例子，说明了英国的汉诺威王朝与法国的奥尔良家族的王室联系巩固了三大国之间的和谐局势。但是，法国和英国的敌对关系已经持续了太久，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战争舆论使得英国人普遍不欢迎与法国结盟。与之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拿破仑战争和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的舆论攻势在英国激发了民族主义倾向。实际上，这并非亲法情绪的倾泻。正当权的辉格党人，反而将与法国的友谊视为打压竞争对手西班牙天主教波旁势力的一个机会。与此同时，罗伯特·沃尔波尔时期的亲法派——在野托利党人，支持对法国采取绥靖政策。因此，到了18世纪20年代，英国各派政治家都和一个意料之外的短暂联盟绑在了一起。简而言之，重新成为法国天敌的趋势，妨碍了英国对欧洲大陆施加影响力。

这种出于机会主义的短暂友好关系，与威廉·佩恩的理想主义的“欧洲现在与未来的和平”相差甚远。但是，其他不屈不挠、满腔热忱的欧洲人，也加入佩恩的斗争中。尤其是夏尔-伊雷尼·卡斯特·德·圣皮埃尔（1658-1743），这个法国耶稣会牧师、外交家和作家信奉“永久和平”的观念。亨利四世、佩恩在呼吁建立联合机构时也是秉承着这一理念。圣皮埃尔研究了哪些机构能够通过“一个常设仲裁机制”和司法审查来支持废除战争。到了1708年，这个法国神职人员开始执行他的和平蓝图。他也终身在改进这些理念。对他而言，欧洲外交在路易十四的一系列战争后形成的局面，不过是愤世嫉俗的现实政治；随后达成的双边协议同盟，都是暂时性的；相反，欧洲需要的是所有国家都签署的“基础性大联盟条款”。

引人注目的是，一些人在圣皮埃尔的作品中发现了后来的超民族主义蓝图，例如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事实上，圣皮埃尔是第一个提出“欧洲联盟”一词的主要作家。一直到1992年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才正式确认了这一称呼。不过，圣皮埃尔的确带来了切实的改变，而且，他还是乌得勒支和平谈判中的核心人物。后来到1738年时，他希望让乌得勒支的和平条约走得更远，而不仅仅是对法国专制主义的一个反击。他倡导建立一个议会，和亨利四世早期提出的类似。他的计划被详细地记录下来，和早前的蓝图相当。他倡议的欧洲议会将由欧洲各国依据自己的财政收入按比例出资。但是，“永久和平”并非和平主义，相反，如果对手违背了自己的政策，成员国可以在获得75%的多数赞成的情况下进行干预。圣皮埃尔的跨国机构的开支，预计会因为军事成本的降低而大大增加，受到监管的裁军也可能随之而来。参加议会的国家将是“基督教国家”。值得注意的是，和贵格教徒佩恩不同，圣皮埃尔因耶稣会信仰拒绝奥斯曼土耳其加入自己的欧洲联盟雏形。这一具有倾向性的基督教联合会，更像是后来（由法国主导）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欧盟。

圣皮埃尔担忧参与的欧洲国家过多会让协议流产，因为“没有一个联盟或同盟可以在没有常设仲裁机构的情况下持久……除非欧洲主权国家联合起来，否则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保证履行所有的承诺和协议”。他承认，自己倾向的超民族主义，即使欧洲各国意见不必统一，还需要两百年才能实现。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欧洲可能要长期忍受战争。讽刺的是，这一圣皮埃尔式想法，让欧洲在1938年走向其历史上最具灾难性的战争。不过，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的成立以及《罗马条约》的签署时间接近他的预期，这两点与他对欧洲和平建议想法的倡议非常相似。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 (<https://www.shgis.com>)

文档名称：《欧洲帝国：从民族国家的崛起到英国脱欧》斯图尔特·斯威尼.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om/post/5103.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